

隋代大总管府僚佐考

李 娟

摘 要: 隋代总管府分上、中、下三等置于诸州,其中统辖数州及至数十州的俗称大总管。隋代设置了四大大总管,由亲王、勋臣担任,其四大总管府的设置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有所变更。大总管府僚佐也随着总管府的变更而发生变动。隋文帝在选择大总管府僚佐时遵从两个原则:“贞良有众望者”与执政之能,目的是为了皇子能够同时起到辅助与监督的双重职能。研究隋代大总管府僚佐制度,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隋代政权兴衰与存亡的真实原因,对研究唐代节度使之乱亦有参考价值。

关键词: 隋代史考;大总管;僚佐

中图分类号: K241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文章编号: 1001-490X(2009)9-206-03

作 者: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生;福建,厦门,361005

隋代的大总管即原北朝都督诸州诸军事之任,最早大约出现于西魏时期。总管制度则正式确立于北周武成元年(559年)正月。关于北周及隋代的大总管制度,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,如张焯先生的《北朝的都督制》^[1]、《北朝的大总管制——兼论周隋府兵军府的建置》^[2]、艾冲先生的《隋代大总管府制的发展与废止》^[3]、《论北周总管府制的创立与发展》^[4]、盖金伟、王鹏辉《北周总管府制度研究》^[5]等。但是对于在北周时已经出现、并由隋代承袭的由勋臣或皇子出镇大总管镇守一方的现象,在以上各文中却几乎没有详尽的描述和总结,本文即试着对于隋代的大总管及其僚佐的设置进行说明和论证。

一 隋代大总管府僚佐制的渊源

大总管制度在西魏北周时期就已经存在。西魏北周都于长安,疆域范围即今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湖北一带。当时以秦州、益州、襄州(或荆州)为陇右、巴蜀、荆襄三方的襟要重镇,置总管府(秦益二州,西魏时尚称都督府),统当地驻军,由勋臣或皇子出镇,是为大总管的开端。魏晋以来,逐渐形成一些军事指挥区域,即都督区。其长官称都督,都督例兼所驻某州的刺史,兼治军民。大区都督常兼管数州,称为“都督诸州军事”。东晋王敦为江州刺史,镇武昌,都督江、扬、荆、襄、交、广六州军事,即以长江中游为中心,直至岭南地区均归其指挥。南北朝承魏晋之制,均有都督之设如北魏有都督中外军事都督府州诸军事、都督三州诸军事等北周明帝武成元年(559),始改都督诸州军事(疑为都督州诸军事)为总管,总管兼任所驻州刺史,并统辖邻近各州。建德六年(577)北周灭北齐,于

北齐旧地增置一批总管府。总管府的设置,或在都会之地,或处守御之要。北周总管府中,洛州、并州、相州最重要。北周武帝平齐后,于相、并两州总管府各置行宫及六府官,即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府,取代北齐之大行台(见行台)。后废并州六府。大象元年(579),移相州六府于洛州,称东京六府。河阳、幽、相、豫、兖、青、徐七总管,皆受东京六府统辖。隋代总管府分上、中、下三等置于诸州。其中统辖数州及至数十州的俗称大总管,如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,管二十四州诸军事,后改授汉王杨谅。杨俊转任扬州总管,镇广陵,管四十四州军事。蜀王杨秀为益州总管,管二十四州诸军事。大业元年(605),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,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。唐初于缘边及襟要地区的一些州治置总管府,领军出征者为行军总管或大总管。武德七年(624)改称都督府,而行军总管及大总管不变。隋代大总管有四,同样是由亲王、勋臣担任。开皇之时,鉴于周末宇文赧消黜公族,皇统因此而坠的教训:“并、益、扬三州以亲王临统”,^[6]这里的三亲王即镇守扬州的晋王杨广、镇守并州的秦王杨俊以及镇守益州的蜀王杨秀。但事实上,此处所指三大总管为开元十五年事,开皇十七年,在秦王俊死后,接替他任并州大总管的还有汉王杨谅。隋代四大总管府的设置,是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有所变更的,大体可以分平陈之前、平陈之后、杨谅接替杨俊任并州总管以后三个阶段,大总管府僚佐,也随着总管府的变更而发生变动。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隋代总管府僚佐的设置。

二 隋代大总管府僚佐的设置及品秩

(一)承袭北朝时总管府僚佐旧制

据王仲荦先生考证:“北朝时总管府僚佐有:长史、司录、治中、中郎、府掾、府署、列曹参军(记事、户曹、仓曹)、参军事、防主等职”^[7]。行台僚佐的设置没有固定的规定。由于北魏后期可以担任行台长官的情况不同,尚书令、尚书左、右仆射、各部尚书以及仆射的佐官尚书左、右丞都可以作为行台的长官,因此,行台的僚佐设置情况自然也就不同。行台尚书令、行台左、右仆射拥有僚佐,自不待言。行台尚书也有僚佐。如前所述,北魏后期,行台长官可以为尚书左、右丞,薛庆之、薛和、源贺、李晔、费穆、高元荣、裴良、张普惠、崔孝芬、李苗、杨机、曹世表等人都是以行台左丞或右丞而作为行台长官的。可是,在他们任职期间,都不见有设置僚佐的记载。这说明,北魏后期,以行台左、右丞为长官,由于官位较低,因此很难设置僚佐。行台僚佐设置不固定还表现为,同一品级的行台长官所设僚佐的数量并不相同。如前所述,行台尚书左、右仆射担任。可是,行台尚书仆射拥有僚佐的数量却有明显的差别。统计行台左仆射萧宝夤拥有的僚佐有:冯景、苏湛、于道穆、梁

昕、封伟伯、韦湛、郭子帙、柳楷、李充,多达九人。其中冯景为大行台都令史,梁昕为行台参军,其余皆为郎中。可见萧宝夤拥有的僚佐最多。而其他的行台尚书仆射与萧宝夤相差很多。隋承周制,大总管府僚佐的职位设置也大体是这样,但是由于隋代除荆州大总管外,其余三大总管皆由皇子亲任,《隋书·元岩传》载:“时高祖初即位,遣晋王广镇并州,蜀王秀镇益州。二王年并幼稚,于是盛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”。所以隋大总管府僚佐与北周一般总管府相比,是有区别的。

(二)大力革新北朝总管府僚佐设置及品秩

隋代大总管府僚佐的设置与北周相比,多添司马一职,列曹参军的设置也有所不同,北周时期的总管府列曹参军为记事、户曹、仓曹三职,而隋代大总管府列曹无记事,另列记室职,添加法曹、兵曹、士曹三职。防主一职在隋时不见于大总管或总管府,而在炀帝大业三年四月罢州置郡之后,在各郡始设防主;《隋书·百官志下》“(大业三年)罢州置郡,郡置太守……又置诸防主、副官,掌同诸镇”,与北周总管防主一职无碍。除此之外,总管司录、治中、中郎、府掾等职设置大体与北周相同。

至于大总管及其僚佐品秩的设置,则由于隋代担任大总管的亲王与一般总管不同,大总管府的僚佐也格外地引人注目,但是需要注意的事,隋代大总管并不是职事官,虽然自北周起总管府便长期存在,但总管一律加使持节,属于中央外派临时机构。隋立国之初在任杨广为并州总管、杨秀为益州总管的同时,置河北道行台于并州,以杨广为尚书令;置西南道行台于益州,以杨秀为尚书令,即是证明。

《隋书·百官志》载:“上总管、行台尚书仆射,为视从二品;中总管、行台诸曹尚书,为视正三品;下总管,为视从三品。”总管府僚佐一般不会超过三品,这是指一般总管而言,大总管府僚佐却不以此规定为准。《隋书·宇文弼传》载:“时朝廷以晋阳为重镇,并州总管必属亲王,其长史、司马亦一时高选”。如时任并州总管长史的王韶:“高祖受禅,进爵项城郡公,邑二千户。转灵州刺史,加位大将军。……晋王广之镇并州也,除行台右仆射,赐彩五百匹。”根据《隋书·百官志》可知,当时作为刺史、大将军任并州总管府长史,品应为正一品,秩二千石。同时出任益州总管长史的元岩“高祖为丞相,加位开府、民部中大夫。及受禅,拜兵部尚书,进爵平昌郡公,邑二千户”,兵部尚书正二品。然而在大总管府任僚佐者,也不一定是位居一、二品的高官,如:“皇甫诞……寻转尚书左丞。时汉王谅为并州总管,朝廷盛选僚佐,前后长史、司马,皆一时名士。上以诞公方著称,拜并州总管司马,总府政事,一以谘之。”皇甫诞在任并州总管司马之前为尚书左丞,从四品官,张虔威在担任并州总管府参军之前为相府典签,品秩很低,但是无论品秩高低,被任命为大总管府僚佐者,无不是文帝信任的一时名士高选,甚得亲重。在有隋一代各大总管府的发展与变动过程中,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(三)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

隋代大总管府僚佐的设置及品秩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唐朝继承了隋代大总管制度,代专征之任,其僚佐也多同之。自后改为节度大使,署副使,判官为僚佐,如前代长史已下之任。然长史、司马及诸曹是曰官名,副大使、副使、判官乃为使职。有所改易,合随府主。置大使则有副使已下,今若改名使府,不合设官充其僚史。盖因授任者莫详其源,既有副使,又置司

马,参奏重设,遂为其例。况不标於甲令,固须区别著定恒规也),判官二人(分判仓、兵、骑、曹四曹事,副使及行军司马通署),掌书记一人(掌表奏书檄。《齐书》曰:“宋江夏王义恭取邱巨源为掌书记。”),参谋无员(或一人,或二人,参议谋画),随军四人(分使出入)。开元中,凡八节度使(碣西、河西、陇右、朔方、河东、幽州、剑南、岭南,此八节度也),盖古之持节都督江左四中郎将、近代行军总管之任(凡将帅出行,兵满万人以上,则置长史、司马、仓、兵等曹参军;若万人以下,员数递减。自至德以来,天下多难,诸道皆聚兵,增节度使为二十馀道。其非节度使者谓之防御使,以采访使并领之。采访理州县,防御理军事。初,节度与采访各置一人,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。乾元中,始置都统,使监总管诸道,或领三道、或领五道,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。上元末,省都统,后又改防御使为都团练守捉使,皆主兵事而无旌节,僚属亦减。有副使一人掌贰使事,判官二人分判军事。自永泰以来,都团练使稍有加置参谋者)。若朝覲则置留后,择其人而任之(宋武帝起义讨桓元既平京口,向建业,以孟昶为长史,总摄后事;及讨司马休之,伐荆州,以中军将军刘道邻监留府事,皆留后之任也。自后无代无之,不复遍举)。

三 隋代大总管府僚佐的作用——以长史、司马为主

(一)隋代大总管府僚佐历的三次大变动及其影响

北周时设大小总管府 28 个,隋朝开皇三年时实行并省州县,相继撤销了 12 个总管府。但是并州总管府与益州总管府并不计算在内^[8]。并州是东魏北齐之陪都,尔朱氏、高氏的老巢,史称“戎马之地”,实乃控御三边的军事大本营,东魏北齐大军出征时,都从并州发兵。晋州,地于魏晋接壤,是边防第一重镇。隋文帝在篡周之后,于开皇元年二月,便任命长于战术的杨广为并州总管^[9],同年九月,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,改封蜀王(公元 581 年),文帝这样做的用意有三,一是防御北边,稳定根基,此为首要,是重中之重,于文帝而言,北边突厥一直以来就是巨大的威胁;二为控制西南,西南边元,中原力之未殆,是以亲王坐镇,拱卫中枢;三为平陈所备,并州、益州两大总管府的设置,可成对陈的包围之势。所以,文帝在选择大总管府僚佐时慎之又慎,基本上遵从两个原则:“贞良有众望者”与执政之能,目的是对于皇子能够同时起到辅助与监督的双重职能。这一点上来说,以长史、司马二职为至关重要。因此,设置大总管府之初,在并州,文帝派遣王韶、高颎、张衡、冯慈明、裴矩、张虔威等名士辅佐杨广,派遣杨异、令狐熙、元岩、裴文安等人辅佐杨秀,以策万全。“王韶、李雄、元岩俱有骨鲠名,晋王甚敬之”,“韶性刚直,王甚惮之,每事谘询,不致违于法度”,而对于令狐熙则“号为明干,上甚任之”。事实证明,这样的策略,在隋初稳定政局、以图大业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,无论是御北还是防南,都达到了文帝预期的效果。于是,隋开皇三年(583 年),以秦王杨俊为“秦州总管,陇右诸州尽隶焉”,进一步夸大了亲王任大总管的规模,但是,在后来的号称“四大总管府”时,杨俊已为并州总管。

开皇九年(589 年)平陈后,总管府制由北方方向江南地区推广,其数量增加了 10 个,总数为 26 个。随着萧梁、陈朝的灭亡,统一局面的实现,总管府制也普及于南方地区。据统计,仁寿四年(604 年),隋朝共有 36 个总管府,分别统辖若干个州级行政区域。平陈之初,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

事,镇广陵,作为平陈大元帅的晋王广仍旧还镇并州。但是事实证明,秦王俊并不能够安定南方,“十一月,高智慧、汪文进等作乱江南,庐江豪杰亦举兵响应”^[10],“泉州人王国庆,南安豪族也,杀刺史刘弘,据州为乱,诸亡贼皆归之”^[11]。加之隋文帝对于江南的政策上存在着问题:“江表自东晋以来,刑法疏缓,世族凌驾寒族;平陈之后,牧民者尽更变之。苏威复作《五教》使民无长幼悉诵之,士民嗟怨。”^[12]迫使文帝在派杨素南下未果之后,文帝任命并州总管晋王广率师增援江南。同年,“冬,十一月,以并州总管晋王广为扬州总管,镇江都,复以秦王俊为并州总管”^[13]。果然,“晋王广镇江都,以其三吴之望,召令讽喻反者。知命说下贼十七城,得其渠帅陈正绪、萧思行等三百余人。以后,杨素再度出征,由海路入泉州,大破王国庆,诱其捕斩高智慧,这才大致平息江南的反叛。杨素也因公取代苏威,升任尚书右仆射”^[14]。于是文帝决定由杨广长期镇守江都,以控扼江南地区。

最后一次大总管府的变动在开皇十七年(597年)前后。在此之前的一次调整,是开皇十五年(595年)荆州大总管韦世康的上任。在韦世康之前担任荆州总管的有杨素、达奚长儒,曾受任“荆州总管、三十六州诸军事”,但是,是时荆州还未在大总管府之列,韦世康能够以勋臣之名位列大总管,与三大亲王齐名,“时论以为美”,很大原因在于其“和静谦恕”,由于扬州大总管晋王广的经营,其实力越来越强大,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,利用荆州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,刻意抬高荆州总管府的地位,委任较为信任的韦世康,目的是与扬州共成犄角之势,制衡南方。然而,荆州总管府僚佐的设置及品秩,却远不如由亲王担任的其他三大总管。在此之后,由于原并州总管秦王杨秀薨,文帝任命第五子汉王杨谅接替,复为并州总管,“十七年,出为并州总管,上幸温汤而送之。自山以东,至于沧海,南拒黄河,五十二州尽隶焉。特许以便宜,不拘律令”^[15]。这一次也是隋文帝最后一次大规模选拔总管府僚佐。

(二)长史、司马二职在总官府僚佐当中尤为重要

总体上来说,长史、司马二职在总官府僚佐当中尤为重要,格外受到重视,很多时候,长史或者是司马可以在大总管回京定省的时候代决附中军政大事,因此,对于性格懦弱的并州总管秦王杨俊而言,长史、司马王韶、杨异、宇文弼等人几乎是代理总管府内诸事、坐镇一方;而对于蓄意谋划进则取太子而代之、退则画江自治尽有梁齐之地的晋王杨广,总管府长史与司马,则必须是自己培养的亲信,张衡、张虔威二人均是跟随杨广在七大总管府中长期任职、升迁,被杨广提拔重用的。除此之外,对于蜀王秀与汉王谅,长史与司马的作用则多为辅助于监督,如蜀王秀的司马源师“时蜀王秀颇违法度,乃以师为益州总管司马”,汉王谅的司马皇甫诞“时汉王谅为并州总管,朝廷盛选僚佐,前后长史、司马,皆一时名士。上以(皇甫)诞公方著称,拜并州总管司马,总府政事,一以谘之,谅甚敬焉”。

(三)大总管及其僚佐左右着隋代时局

吕思勉先生认为有隋一代:“太子卑弱,诸王擅威,实乃自启乱源。”秦王任大总管坐镇一方,事实上客观地为“诸侯擅威”创造了条件,使得亲王在地方总揽军政大权,培植心腹,几

成割据之势,总管府僚佐的辅助与谋划,无疑是不可忽视的,《隋书》卷六一《郤衍传》“王有夺宗之谋,托衍心腹,遣宇文述以情告之。衍大喜曰:‘若所谋事果,自可为皇太子。如其不谐,亦须据淮海,复梁、陈之旧。副君酒客,其如我何?’王因招衍,阴共计议。”最终,杨广夺取太子之位。在杨广为太子之后,蜀王秀与汉王谅不自安,前者谋反未成获罪,后者叛乱被镇压,其家眷所属皆获罪被斩,最终造成了文帝“五子皆不得寿终”的结果。可知,虽然文帝对于大总管府僚佐的任命慎之又慎,几度防范,但是大总管及其僚佐在政治环境中仍旧是一体,左右着时局的变动。

四 对隋代大总管府僚佐制的反思

大总管制形成于西魏,在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。一部隋代大总管府僚佐制的演化史,折射出了隋代政权由兴起、稳定到衰败的整个过程。毫无疑问,大总管府僚佐制在隋代前期和中期对于巩固政权、维护边防、发展地方社会经济所起到的作用不可限量,而大总管及其僚佐由于权力过分集中,对隋代政权也是个极大的威胁。因此,只有对隋代大总管府僚佐制的渊源、设置、品秩及发展改革进行深入研究,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隋代政权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”的真实原因。同时,由于唐朝继承了隋代大总管制度,其后发展为节度使制,因此,研究隋代大总管府僚佐制,对于研究唐代节度使之乱亦有参考价值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《北朝研究》1989年第1期,第93—97页。
- [2]《北朝研究》1990年下半年刊,第93—96页。
- [3]《唐都学刊》1998年第4期(总第58期)第1—3页。
- [4]《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》2001年3月第1期,第63—66页。
- [5]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3年9月第三期,第43—50页。
- [6]《资治通鉴》卷177,“隋文帝开皇十年(590年)十一月”条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5529页。
- [7]《北周六典》卷十,上海: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622—636页。
- [8]艾冲:《隋代总管府制的发展与废止》《唐都学刊》第14卷1998年第4期,第1—3页。
- [9]《资治通鉴·陈纪九》“太建十三年春二月”条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5438页。
- [10]《隋书·陈棱传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1518页。
- [11]《隋书·杨素传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1285页。
- [12]《资治通鉴》卷177“隋文帝开皇十年(590年)十一月”条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5529页。
- [13]《资治通鉴》卷177“隋文帝开皇十年(590年)十一月”条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5532页。
- [14]韩昇:《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》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98年第二期,第32页。
- [15]《资治通鉴》卷178“开皇十五年冬十一月”条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5549页。

(责任编辑:唐昌福)